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杨大楷 李增春 杨 晔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前 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是一项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密切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而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书在紧密联系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国际比较、技术手段、模型架构、案例剖析等六种方法，深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宏观效应、产业组织效应、企业行为选择的理论问题与技术问题。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依据的研究表明：21 世纪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断创新的世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凭借其综合国力和垄断竞争的优势，不断充实和完善了宏观、微观和 OIL(指折衷理论中提及的三种优势)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则根据自身的特点，初步形成了小规模技术、技术本土化、区位优势以及国家利益优先的适用性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之一的中国，由于其发展阶段的两重性和发展空间的差异性，因而在微观上应形成中国 FDI 理论本土化的基本内核——中国跨国企业 FDI 行为的机理；在宏观上应架构中国 FDI 对经济均衡影响的模型——FDI 产业结构对拉动内需的核心作用。同时，对 FDI 主流理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折衷范式框架下，垄断优势说利用补偿优势获得的垄断地位，成为企业利润的根本来源；内部化理论以交易费用为基础，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效率，获得企业的额外利润；投资发展阶段说依托政府在 OIL 演变中的重要作用，谋求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充分利益；而技术积累说却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凭借创新的技术优势获取企业的利润来源。在技术元素的框架里，垄断优势说和内部化理论对技术的看法是静态的，从事 FDI 的企业仅仅是技术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并在技术扩散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而技术积累说对技术的看法却是动态的，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拥有者，更是技术优势的创造者，这是 FDI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实证分析表明：在吸取国

外宏观、微观和 OIL 主流理论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行业多样化、投资区域分布广、技术结构多层次的特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并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建立起联系,应是一种加快中国 FDI 理论本土化研究和创新进程的可取思路。而在 FDI 博弈论模型和竞争菱形动态模型基础上,建立起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收支均衡“三结合”的中国 FDI 宏观经济模型,则提供了一条探索中国 FDI 本土化理论研究的技术路径。

21 世纪的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表明:从国际上看,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以智力资源与知识占有、配置、生产和消费为基本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形态的转变引发了国际投资的深刻变革——国际投资正在改变传统的以寻求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为导向的初级形式和以寻求资本密集、规模扩张为导向的中级形式,代之以寻求加以创新为导向的高级形式。投资总额扩大化、投资区域集中化、投资方向高科技化、投资主体集团化、投资方式并购联盟化、投资行为自由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为了保证 FDI 的有序运作,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架构 FDI 的政策框架——从主权国的国内法规到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从区域性投资协议到全球性多边协议,无一不是向市场化和简便化方向推进。从国内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转变经营观念,投身国际竞争,获取高新技术,推动产品创新,盘活存量资产,提升产业结构,在改善国内供给的同时,支持了国家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FDI 加强了国际间的经济交往,逐步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中国的 FDI 对宏观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它与中国财政、银行和外汇之间的经济关系。它们的联系,不仅是因为 FDI 为财政创造来源,也不仅是因为 FDI 是信贷经济的群体客户,或是因为 FDI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影响。这种联系,通过可以获得的资源配置的变动以及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成为产业政策上的联系。它们的区别,又不只在于 FDI 具有不同于财政、银行、外贸的经济性质。这种区别,通过能否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表现为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合理搭配与灵活调整。实证分析表明,历经 20 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思维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与融合。投资规模扩张化、投资区域亚太化、投资指向资源加工化、投资主体机构化,亦成为其从投资周期的第二阶段步入第三阶段

的新特点。在当前以扩大内需为工作重点的情况下,发展 FDI 与扩大国内需求关系密切。然而,由于 FDI 是一种特殊的“走出去”的行为,无论是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或是从国家外汇储蓄的状况来看,都存在一个适度扩展 FDI 规模的要求。FDI 的规模和规模的增长速度与 GDP 和国际收支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在扩大 FDI 规模时,应首先考虑到人均 GDP 的状况;在调控 FDI 规模的增长速度时,应考虑到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一般地,年度 FDI 规模增长界限应当不超过出口创汇率所能筹措到的资金;而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性越高,就越能保持 FDI 规模和质量的可持续性。对策论的研究结果表明:面对新的形势,中国 FDI 政策框架的目标应当是: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挥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鼓励企业利用国外智力资源,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设计中心;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现国际化发展;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机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具体的政策安排包括:一是加强宏观引导,推进多边合作,克服跨国进入壁垒;二是扩大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弱化跨国差异效应,优化“走出去”投资环境;三是研制对外保险立法,落实条约协定,健全对外投资保障系统;四是设立促进机构,简化项目审批,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五是深化体制改革,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打击资本非法外逃。为了支持上述研究,在技术手段上,我们通过双变量因素检验模型,时间序列变量 ADF 检验模型,以及 J 型分布模型的研究,论证了发展 FDI 与扩大国内需求的基本关系;通过托兰蒂诺的横截面模型和刘红忠的 Panel 模型,获得了中国 FDI 正由第二阶段迈入第三阶段的判断;同时,采用了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灰微分方程技术手段对我国 FDI 增长规模作了中期预测:其中 2003 年以不超过 40 亿美元为宜,而 2004 年和 2005 年 FDI 的增长规模可控制在 50 亿美元和 55 亿美元左右。

21 世纪的国际直接投资依然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组织效应的理论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跨国传导的反馈效应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建立,一是对外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影响而形成的间接产业结构优化渠道;二是由产业结构调整、相对量偏差调整、竞争效应和波及效应共同

形成的直接产业结构优化渠道。当 FDI 绕过关税壁垒、占据有利位置、优化资源配置、获取先进技术、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产业素质、推进产业互动、发挥后发优势、形成有效增长点时,就会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之,当 FDI 无序产业外移、削弱原有基础、忽视技术创新时,就会引致产业空心化。然而,作为 FDI 微观投资主体多国公司(MNC),在三类内生模型中,以垂直一体化的多国公司(VMNC)在产业传导中的参与程度最为密切。因此,中国发展 FDI 选择的产业应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辐射效应,应有利于重塑国际分工格局,即在第一层次上,以“产业组合区位优势”为标准选择 FDI 的产业方向;在第二层次上,以“产业内垂直贸易量”为产业选择约束条件;在第三层次上,以“结构高度化同质性”规制 FDI 传导机制的性质和方向。实证分析表明: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仅面向国内的市场竞争,而且面临国际竞争巨大压力的现状,必须突破以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发展对外投资,优化产业结构。与此相对应,应注重产业发展顺序,转移传统产业,提高资源效率,实现产业升级;寻求产业集群,获取区位优势,利用产业辐射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扶持研究开发型投资,推进人力资本积聚,开辟新兴产业,实现产业高度化的直接牵引,变后发优势为竞争优势,应是目前可取的积极对策。从技术方法的角度看,分工收益曲线、知识——资本跨国公司模型,以及因素分析法,均可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产业机理、MNC 在产业传导中的功用、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提供有益的技术手段。而实证分析法和指数分析法,则为探讨中国纺织业和家电业发展 FDI 提供了一种技术路径。

21 世纪的国际直接投资更加加快了企业国际化的进程。跨国投资是现代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标志。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行为选择的研究表明:它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企业 FDI 的发展需求,即市场指向型需求、人才指向型需求、资源指向型需求、绕过壁垒型需求,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企业 FDI 的战略性进程,即投资战略全球化、经营战略联盟化、研究战略前沿化、文化战略本土化、组织战略扁平化。同样地,21 世纪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区位选择。理论研究揭示:吸引 FDI 眼界的区位,是一个由东道国自然、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条件构成的复合型集合体。因此,中国企业 FDI 的首选区位应当是:要素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经济一体化程度高、需求潜力强、基础设施好、政策透明度高、法律体系完备的东道国。毫无疑问,各国发展 FDI 的动力主要是为加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但是 FDI 在整个活动

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不仅会给 FDI 自身而且给整个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因此加强 FDI 的风险管理是极其重要的。最新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FDI 风险管理的核心原则是:全面重视、手段多样、稳健安全。按照这些原则,变被动式的时点控制为主动性的过程控制将成为中国企业 FDI 风险管理的最新趋势。对策论研究表明:从行为选择来看,中国企业在拥有市场规模信息优势和销售效率的条件下,FDI 是一种优于契约方式的进入策略;当东道国和母国市场环境比较接近时,企业应选择产品调整策略;为了降低市场风险,企业应充分运用转移价格策略;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应采用知识主管主持下的学习型组织策略。从区位选择来看,能够满足中国企业 FDI 区位选择不同偏好的顺序,在总体上应呈现如下排列:亚洲、拉美、非洲、澳洲,以及西欧的东道国。从企业自身来看,要积极发展具有对外投资竞争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就必须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向企业下放涉外经营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依照国际公司运行规范和惯例创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时,要鼓励企业以收购、兼并、参股、投资等形式,控制一批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从风险管理来看,常规管理框架,总是从规避到控制,再从隔离到结合,以及从转移到自我承担;而创新管理框架,则应是强化事前风险管理意识,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预警系统,重视风险事中管理,启用事后财务分析模型。技术研究表明:从战略选择来看,MNC 资产运作模式有助于验证企业发展 FDI 的战略框架;对波特模型改进而提出的钻石模型,不仅将企业竞争力视为内生变量,强调了企业改善竞争力的能动性,而且还将它与对外投资战略联系在一起。从区位选择来看,在对法默—里奇曼模型、冷热评估模型、等级评分法、多因素分析法、动态分析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企业 FDI 环境评估模型,考虑了更多的环境因素和动机偏好,从而形成了更适合于中国企业 FDI 区位选择的操作技术。为了加强对 FDI 的风险管理,必须坚持最基本的技术路线,即:确立指导思想→了解风险环境→识别风险种类→衡量风险程度→拟订管理策略→建立授权计划→具体实施方案→评估实施效果→总结方案→反馈。而支撑技术路线的管理方法(APV)中的税后债务成本和产权资本成本评估方法,也应走出“象牙塔”,进入到我们置身其中并称为“知识经济”的这个新时代。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本书还采用案例分析法,探讨了首钢、海尔、小天鹅集团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本书既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应分析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70172009)的最终成果,又是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的一项重点研究项目。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兼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大楷教授任该项目组组长。在此之前,项目组已先后承接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关投资学领域的五项重点研究课题^①,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有关投资学领域的七项重点研究课题任务^②。这些积累为我们撰写这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本书撰写的主要人员有:上海财经大学与西南财经大学的博士及博士后等。其中:第一章由杨大楷、杜新乐、曹黎娟撰写;第二章由刘庆生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由杨晔撰写;第五章、第六章由李增春撰写。此外,蒋萍、乔飞、彭晓播、林涛、陈军、赵旭强、胡娟、晏玲菊、顾建伟、谢清喜、蒋南平、彭成、孟雪莲、马春阳、乔惠平、常定辉、李崑、薛祖松、刘正奇等,他们承担了本书的资料搜集、信息整理、案例分析、专题梳理、阶段性成果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最后,由杨大楷进行总纂和定稿。

杨大楷 李增春 杨 晔

于上海财经大学春晖园

2005 年 12 月

① 参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0BJL03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债管理与利率研究》,项目编号:797901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启动民间投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2BJY1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战略与监管框架研究》,项目编号:04BJY0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债规模的控制与管理》,项目编号:97BJB052。项目组组长均为杨大楷教授。

② 参见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中国发展跨国公司与上海的对策》,项目编号:2004-A-14;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上海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研究》,项目编号:2005-A-09;上海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重点项目《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趋势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026921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直接投资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项目编号:2002AJL00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上海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研究》,项目编号:2004XAB004;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发展态势研究》,项目编号:2005SBG001。项目组组长均为杨大楷教授。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投资理论的比较研究	1
第一节 基于寡占的垄断优势理论	2
第二节 基于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理论	6
第三节 基于折衷主义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11
第四节 基于国际产业互动的技术累积理论	17
第五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研究	22
第六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29
第七节 中国对外投资的理论构架	36
第二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国际比较	41
第一节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41
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分析	55
第三节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分析	72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分析	85
第五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88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93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经济影响分析	93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检验	105
第三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性研究	109
第四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度规模研究	121
第四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观效应研究	131
第一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优化效应	131
第二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导产业选择框架	149
第三节 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行性分析	156
第四节 中国家电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行性分析	166

第五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效应研究·····	173
第一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效应·····	173
第二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180
第三节 中国企业竞争力与对外投资战略选择·····	194
第四节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评估与区域选择战略·····	207
第五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225
第六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研究·····	238
第六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取向·····	248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架构·····	248
第二节 西方发达国家国际投资政策·····	260
第三节 中国对外投资政策评价·····	270
第四节 中国政府对外投资政策选择·····	276
参考文献·····	299

第一章 国际投资理论的比较研究

国际投资是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范畴。起始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发展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盛行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投资已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力量之一和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的理论研究伴随国际投资的发展,历经了数个阶段的演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投资是以国际间接投资为主,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资本存量和流量中所占比重极低,因此,那时对国际投资的研究是将其纳入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性研究框架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进步,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管制的放开、自由化的深化以及科技更为迅猛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急剧攀升,甚至超过全球 GDP 总量、贸易总量、国内投资总量等重要经济指标;直接投资涉及的产业领域与地理区域不断扩大、形式也获得不断丰富;对国际投资的研究不仅保持了其一贯以来在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研究范围和视角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尤其是一些针对新形势、新现象和新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站在了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譬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的适用性理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计量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该领域的研究)等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作为受资国还是投资国,在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地位都日益提高。事实证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最佳区位、获得国际竞争力和控制能力的关键。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我们有必要对其理论依据与经济影响作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依据。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由计划到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的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大国,其经济体系与经济发展轨迹必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步骤与理论构架必然具有其特殊性。我国入世后,在全球开放经济的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领域内所包含着的信息与技术的资本双向流动对塑造一个国家、产业乃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在现有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情况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研究。

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相比,国际投资理论显示出较强的多样性。首先,从战略或动机角度看,国际投资活动有资源获取型、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全球一体化等不同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国际投资活动引发的的问题不同,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也不同。其次,基于以上的原因,用于解释不同类型国际投资活动的理论也是多样的。国际资本流动、贸易、经济增长、区位选择、产业组织,以及有关创新的经济学理论都被用来对国际投资活动作详细的分析与说明。再次,对国际投资的分析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进行,即宏观层面,考察国别的与全球的趋势;中观层面,考察产业层面上企业间的互动;微观层面,则考察个别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因此,国际投资宏观理论的发展往往依赖于贸易、区位选择、国际收支以及汇率等理论;中观理论研究则深深植根于产业经济学,博弈论、创新理论等;而微观理论则以厂商理论为分析基础。根据上述差异,当代主要的国际投资理论可以划分为四大类(见表 1-1)。本章将选取各个理论类别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并在以下各节中进行分析比较。

表 1-1

当代国际投资理论流派

理论大类	分析层次	理论分析基础	代表性学说(或学者)
市场力量说(The market power approach)	微观	企业垄断、寡占理论	海默(Stephen H. Hymer)、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的垄断优势说
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微观	科斯的企业理论(交易成本)	鲁格曼(Rugman)、巴克利(Buckley)、卡森(Casson)、凯文(Cave)、蒂斯(Teece)、威廉姆森(Williamson)
宏观发展理论(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al approaches)	宏观	折衷主义分析框架	产品周期理论(早期)(product cycle model Mark I)、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投资发展周期论(investment-development cycle approach)、投资阶段论(stages of development approach),以及阿利伯(Aliber)从金融资本角度考虑的 FDI 理论等
国际产业竞争理论(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industry approaches)	中观	国际产业竞争性互动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晚期)(product cycle model Mark II)、技术累积说(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pproach)、竞争性企业成长说(comparative firm growth approach)等

第一节 基于寡占的垄断优势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初,产生了从厂商寡占行为角度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发生机理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强调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经营控制问题,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明确区分开来,直接投资理论才开始作为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一支独立的理论分支发展起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也从过去主要侧重国际资本流动的宏观角度转到了投资厂商

行为及市场结构运行的微观角度,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直接投资与其说属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不如说属于产业组织理论”。^①

一、理论主旨

垄断优势说是市场力量学派的代表性学说,也是现代国际生产理论的奠基石。该理论是海默于 1960 年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该论文的核心命题是为了在与具有先天优势的当地企业的竞争中取胜,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补偿优势(compensating advantage)。该命题一下子将研究国际生产活动的视角从资本流动理论引导到产业组织理论,为解释跨国直接投资现象开辟了新的途径。海默摒弃长期以来流行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所惯用的完全竞争假定,根据厂商垄断优势和寡占市场组织结构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此基础上,海默与他的导师金德尔伯格界定了外国企业可能具备的补偿优势,并证明了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对于具备特定优势的企业而言,直接投资比其他跨国经营方式更容易获得该补偿优势带来的利益。至此海默—金德尔伯格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它认为企业必须拥有特定的可以内部转移的优势使其在东道国市场上拥有潜在的垄断机会是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

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提升垄断优势、扩张市场力量的手段。在发展初期,企业通过自我积累或者并购,扩大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伴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企业的垄断优势与市场力量得到不断的强化,同时企业的利润也随之获得增长。但国内市场是有限的,最终总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只有几家大的企业保留下来,并且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在国内市场继续扩张。这种状态下,幸存的大企业将把国内获得的垄断利润投资到对外生产中,并在对外相关市场中复制相同的市场集中过程。这些观点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直接投资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海默也因此而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先驱。

二、垄断优势说的两个要素

在海外市场上,外国企业如何能在与具有先天优势^②的本地企业的竞争中取胜;又为何选择海外生产作为在海外扩张的方式呢?海默理论的两个要素给出了解释。

1. 补偿优势

海默认为,为了与具有先天优势的本地企业竞争,外国企业必须具备相当的补偿优

^① C·P·金德尔伯格:《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学》,载于 C·P·金德尔伯格编:《国际公司》,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70 年版。

^② 指本地企业熟知有关当地环境、市场以及商务条件的情况,而这些信息外国企业必须花费相当的成本才能获得。

势。这种补偿优势不仅能使外国企业克服不熟悉当地市场的劣势,还要能弥补因远距离海外生产产生的成本。金德尔伯格(1969)指出了四类主要的补偿优势:第一类优势源于产品市场的不完全,包括产品差异、营销技巧和价格控制;第二类优势源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包括对专利和专有知识的占有、企业管理技巧的差异、资本市场待遇的差别等;第三类优势源于内、外部的规模经济,包括由垂直一体化产生的优势等;第四类优势源于政府干预,尤其是限制产出、限制产业进入的政府干预。在海默、金德尔伯格之后,多名学者对补偿优势作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凯文斯(Caves, 1971)认为补偿优势主要是指跨国企业(MNCs)进行产品差异化,以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能力。约翰森(Johnson, 1968, 1970, 1975)指出补偿优势应该具备公共物品的特性,使MNCs的子公司能以较其竞争对手低的成本获得该优势,特有知识与技能即是这种优势的典型代表。

2. 厂商特有优势

外国企业具备相当的补偿优势后,在出口贸易、许可证生产和对外直接生产几种方式中偏好以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市场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因为市场不完全使作为补偿优势拥有者的外国企业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利用该优势应该取得的全部收益。市场不完全,主要包括买方不确定(buyer's uncertainty)^①,缺乏有组织的知识交易市场,以及知识的定价受到其保密性的密切影响这一特性。这使补偿优势拥有者不能通过竞争性的报价获得优势资产的充分收益。此外,出口方式往往遭遇税收壁垒和不可避免的运输成本;而许可证生产条件下,则可能存在为保护知识产权而产生额外成本以及制造潜在竞争者的压力。因此,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并保持在外国市场的竞争地位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国企业将海外生产作为拓展外国市场的最优选择。

海默认为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企业对投资经营过程的控制不仅是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更可能是因寡占竞争的需要而产生。因此,海默将跨国企业看作是垄断者或寡占者,指出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厂商具有垄断或寡占优势的条件下形成的。

这种垄断或寡占优势被称为“独占性的生产要素”优势,或厂商特有优势。由于跨国企业在国外经营时相对于东道国厂商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这种优势至少要抵销东道国厂商的特有优势并补偿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增加的成本。

关于这种厂商特有优势,最初的厂商垄断优势论主要关心的是厂商的物质资产。例如,海默认为的厂商特有优势,主要是指大型跨国企业所具有的大规模资本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厂商垄断优势论把对厂商特有优势的解釋重点移到了厂商拥有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上。凯夫斯认为跨国企业借以进行对外投资的优势,最重要的应是投资厂商所掌握的先进技术、高效率管理知识等无形资产。

^① 指买方在未拥有产品之前,不能确定该产品对其的真正价值。譬如:技术产品。

根据厂商无形资产优势来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是对现代直接投资发生机理的一种较好的解释。厂商拥有可产生超额收益的知识资产,可通过控制知识产权、扩大无形资产的使用范围来实现知识资产的超额收益。由此得到的理论启示是,现代型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控制知识产权进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点无疑是至为关键的),这与主要控制物质资产所有权的传统型直接投资有很大区别。投资厂商只要控制了驱动和支持直接投资的决定性要素——厂商特有知识资产,就可以有效地进行投资并保证获得收益。因此,可不必像先前那样对物质资产所有权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直接投资中,投资厂商从注重物质产权的控制转移到注重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也可以说,随着投资厂商对知识产权控制的强化及其对知识产权收益保证程度的提高,厂商对物质产权的控制逐渐减弱,这成为传统直接投资向现代直接投资转型的重要特征。

三、理论价值

海默的垄断优势说改变了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学说认为国际间生产资本的流动的发生与各国资本的拥有水平以及资本报酬差异有关这一理论传统,另辟蹊径地从企业的角度解释国际生产活动的形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完全竞争理论为前提的。这一理论认为,在市场完全的条件下(即市场具有效率、信息不产生费用、没有贸易障碍、公平竞争等),国际贸易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或对外扩张的唯一方式。企业将根据比较利益从事出口活动。海默则把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市场不完全性为对外直接投资打开了大门。这种市场不完全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即有少数卖主或买主能够凭借控制产量或购买量来影响市场价格的决定;第二,由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第三,由于政府的介入而产生某些市场障碍;第四,由关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他认为,跨国公司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是国际资本的套利者,它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一是通过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来消除它们之间的竞争以确保自身市场地位的安全;二是更加充分地实现其生产技术、管理技巧或产品分销渠道等方面优势带来的利益。厂商垄断优势论既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企业在国外的水平式对外投资,即在各国设厂生产同样的产品;又可以解释垂直式对外投资,即把一种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分布到多国进行。在石油工业中,少数跨国公司在长期内支配着世界石油市场,就是垂直式对外投资的一个很好例子。总之,厂商垄断优势论对国际直接投资发生机理的分析重点越来越集中在“厂商特有优势”和寡占市场结构上,以这两者为基点,为后来众多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海默的探索也为有关国际生产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其从此成为国际经济学的的一个独立分支。

第二节 基于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科斯定理”。早在 1937 年,科斯就在一篇题为《企业的性质》的论文中提出了内部化理论的雏形。^①

一、内部化的经济学分析

1. 内部化理论的基础

内部化理论^②是从组织间的交易效率出发,解释直接投资活动的国际投资理论。传统交易理论有两个重要前提假设:一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一是完全市场。在国际投资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理论分支都试图通过放松这两个假设来解释跨国企业进行的国际投资活动,要么假设企业追求其他目标,要么假设交易处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中。

而以科斯理论为基础的内部化理论则假设组织市场要花费成本,因此竞争是不完全的。科斯所以作这样的假设,是因为现代经济活动本质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加剧使经济活动不再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而分化为多种多样的专业活动。纵向看,完整的生产过程分解为多道工序;横向看,企业活动则分化为研发、营销、采购、培训、融资、资产管理等高度专业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相对独立,并通过中间产品的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中间产品中有的有形半成品,更多的则是包含在专利、人力资源中的知识、技术与专长。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活动之间的有效协调要求存在一个中间产品的完全市场^③,而某些中间产品的完全市场却恰恰难以组织。这就诱发了经济活动中交易组织形式的转变。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为了避开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于是将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企业统一的控制之中,建立内部的交易市场。

1997 年,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撰写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④一书,对企业内部化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即把以前由几个经营单位进行的活动及其相互交易内部化。这种内部化给扩大的企业带来了许多好处,它所造成的节约,要比单纯降低信息和交易

① 科斯:《论生产的结构》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② Chapter 2 A Long-ru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32~65 Peter J. Buckley & Mark Casson, 1976,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NY.

③ 完全市场(a complete set of market),意味着不存在外部性。

④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成本所造成的节约大得多。

建立在交易成本学说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对现代工商企业的起源和成长提供了解释,英国里丁大学的经济学家邓宁、卡森等人将其运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将内部化理论看成是解释跨国企业的形成和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生机理的核心原理。他们在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发生机理时,将讨论重点放在知识资产等中间产品市场上,而不是最终产品市场上。他们认为,厂商所具有的知识资产优势,不是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厂商特有优势是在国内形成的,必须以低成本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转移而发生的成本必须低于由转移而带来的收益。跨国企业为降低转移成本,或者说是交易成本,倾向于构造一个内部化市场以替代通常的外部化市场。所谓内部化是指“建立由公司内部调拨价格起作用的内部市场,使之像固定的外部市场同样有效地发挥作用”。^①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企业保持对专有知识资产的控制,据此形成对外直接投资是由知识产品的市场机制失效所造成的。知识产品市场机制失效,是指产权知识产品价格及产权知识传播价格不能被有效确定,产权知识的模仿者可以比产权知识的创造者较低的成本获得和运用该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为更好地利用产权知识,并保持其特有知识优势,就必须利用内部化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市场是相对于外部化市场而言的。跨国企业为避免在外部化市场销售知识产权所引起的优势散失风险,便组成自己的内部化市场,使企业内跨国界的生产组织、资源调配和内部定价相互依赖、结成一体。正是这种内部化组织方式,使跨国企业能够有效使用企业产权知识,获取更高的收益。国外子公司把在国内市场开发发展起来的产品扩展到国际市场上,在国际经营中保持优势。跨国企业在所有可能的市场上开发利用知识优势,并使利用知识的收益保持在企业内部,以便补偿创造知识所花费的成本。

内部化组织可减少交易成本的原理,对跨国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国内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厂商在国内扩张的边际收益下降,与竞争者的摩擦加剧,交易成本增加,于是便产生了向国外市场扩张的趋向。内部化交易方式使国际经营的交易成本降低,这诱使具有某种特有优势的厂商或者说是潜在的跨国企业作出对外投资的决策,形成跨国企业。

2. 内部化的收益与成本

实际上,外部市场的不完全仅仅是交易内部化的必要条件。组织内部交易本身也要耗费成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内部化带来的收益。只有当内部化收益能够完全弥补因内部化产生的额外成本时,内部交易才真正富有效率。企业最佳规模恰是交易内部化的边

^① A·M·格拉曼:《跨国企业的内幕:内部化市场经济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 页。

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的规模。于是,影响交易内部化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因素决定着企业的规模与范围。

五种市场不完全因素使内部化收益突显:其一,当交易活动出现时滞效应时,与交易相关的外部远期市场可能不存在,致使交易双方无法获得交易所必须的价格信号以协调短期生产安排与长期投资计划。因此,企业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建立内部远期市场,内部化相关交易活动。其二,当外部市场交易中,不能通过差别定价充分利用企业的垄断优势实现垄断收益时,企业愿意通过合并上下游相关企业,在内部市场中充分发挥差别定价的作用,实现整体收益的提高。其三,当市场上存在双边垄断时,双方的交易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产生相互之间的制裁。这种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双方的交易成本。解决的方式通常是达成约束交易双方的长期协议,或者通过合并将交易永久的内部化。其四,当买方与卖方关于交易对象信息不对称时,卖方往往难以说服买方接受产品的定价。此时,买方不确定可能促使卖方以合并交易对手,或以直接竞争的方式前向整合下游交易。其五,国际市场上,各国政府可能以中间产品的交易价格为基础、以从价关税、资本管制、所得税差异等方式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因此,企业倾向于通过内部化交易,以转移价格等手段规避此类干预。

但是,有些环境下内部化将产生高额的资源成本、信息成本,甚至引起政治冲突。其一,由于企业的内部化行为,统一的市场可能被分割为若干内部市场,各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往往因此而扭曲,导致交易效率的降低。其二,市场内部化将导致比外部市场更高的信息成本。因为,首先,在内部交易过程中,企业处理的会计与管理信息较外部市场多;其次,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市场内部化将导致信息系统管理费用的上升^①;再次,内部化市场中为确保信息的准确,不被藏匿所进行的核对、验证,尤其是现场核对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而且,信息成本还会因交易地点之间的距离、环境差异而不同;距离越远,环境差异(主要指经济文化背景)越大,信息成本越高。其三,企业内部化行为跨越国界时,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政府的干预。东道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歧视待遇,以及征用威胁带来的风险等都可能使跨国企业内部化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四,管理内部市场也耗费一定的成本,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管理的专业化程度。

二、内部化与对外直接投资

市场内部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事实上是比较简单的。如上所述,企业试图规避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来提高交易活动的效率。当企业活动涉及的市场跨越国界、不断扩展到世界范围内时,其市场内部化的动机就可能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因为由内

^① 管理费用上升的原因在于,必须为每一个内部市场建立相对独立的信息系统。即使每个内部市场使用共同的信息系统,为保证系统的保密性,也将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